

不必苛责故宫新栏杆

玉渊杂谭

杨雪

故宫最近换了一批新制汉白玉栏杆，惹得很多文物爱好者不满。乍看新闻标题时，误以为是把原有古栏杆全部换成新的，吓了一跳；细看后才发现，其实是换掉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保护文物而增设的金属栏杆。还好，事儿不大。

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故事。汉白玉栏杆有利于阻止游客触摸文物之说显然站不住脚，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加金属栏杆、

加大围栏距离就可以轻松解决，工程量小、成本低廉。至于说用雕栏玉砌与周围建筑更协调，仔细想想，更是一个伪命题：新栏杆那么白，做工也显粗糙，别管远看近看，难看是一定的；假设真有人看不出怪异觉得协调，那么他就很可能被误导，特别是小朋友，这显然又不利于科普。

况且，用金属栏杆本来就是世界通行的做法。游历欧洲的教堂、城堡、皇宫时，无论是作隔离文物还是导览游客之用，见到的都是金属栏杆，从未感觉有碍观瞻。相反，金属线条的好处在于简洁、对比度强，完全不会喧宾夺主而抢了文

物和古建筑的风头。当然，国际惯例完全可以被更好的方法更新，但故宫的创意显然不靠谱。

搞这么一出幺蛾子，故宫这次有点阴沟里翻船。这几年，故宫的表现可圈可点，得到公认，在文物保护、开放和文创开发上都做了很多有益尝试，可谓文保界逆袭的典范。不知道是不是俗话讲的“做多错多”效应作怪，正是急于做的工作太多，才难免一时脑热欠考虑。与上项目用经费的用意比起来，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低级错误。

从故宫回应质疑的说明来看，也不算大糟糕——“石材栏杆与文物不接触，与地

面不生根，可随时安装，随时拆除”。这样的话，新栏杆应该不会对古建筑产生什么挥之不去的影响——如果新栏杆是嵌入的，说不定会困扰几百年后的考古学家，然后有一天终于想明白，一拍大腿：栏杆是古人用来隔离低素质游客的！

建筑在历朝历代使用中难免会根据需要加盖一些东西，流传下来已非最初面貌，这也是历史。但对于保护起来、不作使用的古建筑来说，加装仿制品就是灾难。例如，嘉峪关关城内被修补一新，云冈石窟仿古建筑林立，都比故宫里的新栏杆恶劣得多。

生命是动态平衡的过程

字里行间

孙正凡



生命是什么？这是个充满了哲学味道问题。物理与生物之间、分子与生命之间、生命与环境之间，这些复杂关系保持微妙的平衡，构成了如此丰富如此美好的世界。对此，生物学家进行科学探索，发现生命的基础运作机制，这有助于我们破解人类最久远的困惑。日本青山学院分子生物学教授福冈伸一的《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促使我们跟科学家一起沉思“生命是什么”。

“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本身就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人们曾认为，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有森严壁垒，但生物化学的发展让科学家发现，界限其实是模糊的。通过化学手段，我们可以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质，比如中国非常有名的牛胰岛素的合成。

但有些界限依然森严。比如生命是如何起源的，至今我们还没有接近的答案，科学家们也从来没有凭空制造出生命。作者在大学里的第一堂生物课，老师问：“我们能在瞬间判断出眼前的东西是生物还是非生物，那么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生命到底是什么？”问题的答案依然是科学地平线上不可企及的远景目标。

薛定谔曾在《生命是什么》中预言，尽管生命活动受到基础物理定律的约束，但由于结构不同，大量原子分子组成的生物有不同于物理学的规律，生命存在的条件和方式决定了很多生物学规律是无法被归结简化为物理学基本定律的。事实上，构造变化和复杂程度每增加一步，其中起作用的规律可能

都是有差异的。

正是对其中规律性认识的逐渐深入，在物理、化学等学科的介入之下，古老的博物学逐渐升级为生物学，生物学逐渐分化为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演化生物学等各个分支，它们各有各的研究方向，又相互交叉渗透。

自从沃森和克里克揭示了DNA双螺旋结构，分子生物学成了主流，正如福冈所说：“生命的钥匙就在其中”。DNA可以由四种碱基A、T、C、G表示，三个碱基组合对应一种氨基酸。在消化系统中，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被分解成小分子，组装成氨基酸，它们进入细胞之后，DNA机器又负责把氨基酸联合组装为蛋白质。

福冈曾经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研究，研究对象是GP2基因，这种基因对应的蛋白质对动物细胞膜有重要意义。研究的方式是从小鼠的基因中敲除GP2基因，也就是培育不带有GP2基因的小鼠，理论上来说，这样的小鼠肝脏细胞膜会出现严重异常，带来严重的糖尿病。福冈所在的研究组花费了巨额资金，成功培育了GP2敲除小鼠，核算下来每只小鼠花费高达4万元，但是意外出现了——小鼠的生命活动完全健康，它们的肝脏细胞也没有丝毫异常！

这次实验失败了吗？并非如此，在科学实验中出现“零”结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甚至这样“意外”的结果更能说明深层次的问题。福冈由此发现，我们需要修正生命本质的概念。

生命不止是具有自我复制功能的机器，它更是动态平衡的过程。在DNA中存在大量“沉睡基因”，它们曾经被称为无用基因（在人类基因组中比例高达98.5%）。但生命成长过程中，从受精卵开始的发育过程，每一步都是动态平衡的，这意味着生命体带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当生物学家们敲除某个基因之后，有些基因的功能无可替代，会影响生命体的健康甚至生存；而GP2这样的基因虽然被敲除了，但发育过程的路线图也因此被改变，可能某些具有替代作用的“沉睡基因”被唤醒，从而修复了GP2基因对应的功能。

福冈把生命体视为不可逆的时间洪流中的折纸作品，一旦被折起来，就无法拆开。我们虽然理解了生命现象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但恐怕还有更多问题是未解之谜，甚至连问题本身也尚未发现，这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人类不可能像操纵机器那样操纵生命。对于致力破解生命奥秘的人类来说，研究才刚刚开始。

摄手作

读

(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字载体如何更迭，专注阅读的人们，仍然享受坐拥书城的静谧时光，守护着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本报记者 孙韵孜摄



互联网时代，读书有必要带点仪式感

随想录

韩浩月

从本月起，支付宝在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合肥五城市率先开通了“信用借书”服务，用户信用积分达到600以上，就可以从当地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免押金借书。负责送书和还书的，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快递公司。

这件事听起来挺浪漫，不禁让人想到求学时代通过在书中夹纸条交友的故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阅读纸书、谈论纸书，本身就仿佛被加持了浪漫的光环，支付宝的“信用借书”，等于给这光环又添加了花边，多少都会让人有点心动。事实上有不少先行行动的网友，通过“信用借书”拿到书后，就迫不及待地拍了照发在朋友圈上，当然，书是配角，主角仍然是晒书的网友，以及他们对读书生活的某种想象。

笔者认为，“信用借书”在早期的新

鲜感，可以满足一些用户的好奇心，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在用户广度和深度方面，也无法实现令人满意的成绩。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法重复“书非借不能读也”的过去，在各大网络书店隔三差五的促销下，所有读者心仪的新书，很多都能在打折之后还能以“满200免100”的便宜价格收归囊中，但凡是爱读点书的人，家里书柜的存书，恐怕每周读一本的话，一辈子都读不完。

年龄大一些的读者，对纸书阅读还有习惯性的依赖，而对于年轻读者来说，他们早已习惯了电子阅读，手捧Kindle等电子阅读器，就像坐拥一座藏书数十万册的个人图书馆，一次下载，终生免费阅读，很难想象他们会费尽心神地借阅读纸书，要填申请表，要选书，要收快递，还书时还要请快递员上门……就互联网体验来讲，“信用借书”对于懒惰的网民来说，程式还是太复杂了些。

如何提升国民阅读率，让大众阅读逐

渐再热起来，这些年从政府到民间，无不为这个话题操碎了心。今年好歹收获了一个不错的结果，4月份一项大数据统计显示，中国网民“每天或每周都读书”的人数比例高达70%。从国民阅读率连续六年下降，到70%的网民“每天或每周都读书”，这个变化差异，显然不是来自于纸书，而是来自于电子阅读的快速扩张。

在笔者看来，通过互联网平台来推广纸书阅读，无法收到理想效果，这是互联网特质决定的，鉴于目前电子阅读的发展状况，以及网民社交需求分析，“信用借书”很容易就可以被认定为一个“伪命题”，不过是互联网企业做的一项低成本品牌推广。

起码在未来一二十年，纸书阅读和电子阅读将会并存。那么互联网时代纸书怎么读才有味道？笔者认为，首当其冲的，是要拒绝各种读书活动的炒作。读书需要静心，想要认真地读完一本纸书，关闭互联网接入设施，踏踏实实、安

安静静地读几十页书，是现代让人让纸书阅读回归本位的一种“保守”坚持。

互联网时代，读书要读经典。在各种出版信息铺天盖地、图书品种五花八门的时候，选书成为一件麻烦事，而对于网民来说，选择一些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无疑是绕过烂书的一条捷径。人类出版史上留名的经典著作，从人文历史到文学名著，留给了读者以足够巨大的挑选余地，有时间读纸书的话，不妨从这些经典开始读起，无论在愉悦性还是实用性方面，都要超过那些花哨的商业文学书籍。

当然，想把阅读当成一种消遣，读一些处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商业文学作品也无厚非。但就算是享受一本网络文学作品，也有必要带点纸书阅读的仪式感——书桌前，阳台上，沙发上，关闭门窗，手机静音，权当互联网不存在，安安静静读片刻书之后，你会发现内心微妙的变化，这样的读书方式，才是真正的阅读。

存

一键击出，一字飞去，一言成句，一句成文……在这个宇宙里，什么都不丢会失。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几乎是人类永恒的困扰。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科学家近日宣布，他们第三次探测到30亿光年前，由双黑洞合并事件产生的引力波时，朝胜利顿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似乎并不重要了。因为，在这个宇宙里，什么都不丢会失。大到30亿光年前两个太阳转化的能量以引力波形式释放，小到中微子震荡的发现。千万不要痴想什么“一了百了”的侥幸，就算是人死了，一辈子举止言谈的账都烂不了。

况且还有互联网、大数据。不论电脑还是手机，一键击出，一字飞去，一言成句，一句成文……那字那句那文就是你的见证。有时候想想不妥，想撤都不可能。此刻的不妥，也是思维过程的一个真实存在。

以前有句话，“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说的是上呈官衙的文书和诉状，每一个字都是无法更改的。学新闻时，老师也常常叮嘱，要对稿件的每一个字负责，因为今天的新闻是在记录明天的历史。

果然，几十年的新闻生涯，手中的笔在不经意中，记录了历史演变，有的美好、有的丑陋、有的前行、有的倒退……当过几十年记者的同仁，如果把自己发表的文字从头到尾地看一遍，有些文字由不得你不惭愧脸红……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满腔激情地指鹿为马，通宵达旦的文字垃圾，自欺欺人地助纣为虐……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得意……

原来，新闻对历史的记录，常常“偏以今是论昨非”！

元曲《桃花扇》里唱道：“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短了。”

短短五十年而已，竟似看了一场戏。朝胜也在金陵秦淮工作生活过，想想犹如昨日，屈指算算居然也快三十年了。这三十年台上台下的兴衰，也算看了个“半饱”……

如果过的是粉墨衣冠的日子，“你方唱罢我登场”，忙忙碌碌，真真假假，磕磕绊绊，云云雨雨，那日子过得不像个日子。

那是更多的凡人，几十年、一辈子，甚至几代人都在浸淫琢磨一种手艺。或者说，靠一种手艺立身几十年，养家一辈子，传承几代人。那岁月才叫岁月！

自打电脑成了书写工具，用笔写字的越来越少了，用毛笔写字的更是凤毛麟角了。物以稀为贵，于是拿毛笔写字就不叫写字而叫“书法”了。

朝胜有幸幼时学过大字描红，当编辑时编辑稿还是用毛笔，所以对当下的书法，总有一种手艺的感觉。

一回和朋友欢聚，酒酣之际几位书法家展纸运笔，醉里泼墨。一位颇有功力的老书法家，写成一字点下最后一个“点”时，借酒感慨：“没有下过功夫过万点，如何能够点出今日之点！”

仅仅是一个“点”就要练习万次以上，您说不是手艺是什么？

书圣王羲之认为：“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唐代书论家孙过庭曰：“一点之内，殊拙挫于毫芒”。一个“点”成，尚且如此艰难，那一篇之功德蕴含了千年手艺造化，人生百年能够写出像模像样的一笔一划，当为大功了。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古人讲的三百六十行，大体是指手艺。制造业从金银铜铁到针织刺绣，建筑业从榫台亭阁到瓦灶绳床，饮食业从钟鸣鼎食到发酵腌渍，木匠业从雕梁画栋到榫卯结构，娱乐业从戏曲杂耍到说学逗唱……

每一行的状元，都是千百年的匠心独运刻苦传承。多少手艺浸透了多少家族的骨气志气运气，直至今日凝成了一个民族的骄傲——“工匠精神”。

这种精神，必将沛然于天地寰宇之间，也是永远丢不掉的。

青年王国维之烦恼

桂下漫笔

胡一峰



王国维先生逝世已经90年了。今天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王国维，大都身形干枯，神情落寞，闷闷不乐，用他自己的话说“体素羸弱，性喜忧郁”。依我想来，王国维在世时，心中定是有不少烦恼的。他为人老实。鲁迅说他老实得像火腿，鲁迅又说老实是没用的别名。不消说，王国维是个极有智慧、看事极远的人。然而，老实人拥有智慧，并非幸事。有菩萨心肠无霹雳手段的人，结果往往是苦了自己。他的自

沉，就与此有关。

不过，我想，王国维最大的烦恼还是来自内心分裂。近代学者中，王国维大概是与“难题”最有缘的学者之一，我以为他最耐琢磨的一个难题，是其青年时提出的可爱与可信的问题。当时，他正痴迷于哲学，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哲学上之谓，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醉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

发现这一点，让30岁的王国维很不爽，“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恼”。这里的“可信”，大概是指能为经验证明之物；而“可爱”，则是心向往之，却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东西。与此可形成对应的是王国维的自我鉴定：“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如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犹疑的语言，流露出的也是困惑与迷茫。

其实，“可爱”与“可信”的问题岂止存在

于哲学，分明是天下思想学说之任督二脉。有志于操练思想的人，必打通此二者，方有大成。许多开宗立派的思想家于此闭关苦参，几乎耗尽了一生心力。就说马克思吧。按照他的好基友恩格斯的总结，老马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发现了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另一件是创立唯物史观，回答了人类社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两件事说到底只是一件事，就是揭示出那个“可爱”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可信”的，有一条现实的道路可以抵达。那些历史悠久，取得世界影响的大宗教，向世人描绘“可爱”的彼岸世界之时，也总不会忘记给出一张至少貌似“可信”的船票。不过，谁也不能保证拿着这张船票就能顺利登岸，甚至无法确指船在何处。

再看科学领域，是最讲究实证的，但一切“可信”的实证手段也都指向“可爱”之境。我们平时说那种理论或学说很“科学”，多半也是指它为“可爱”赋予了一个“可信”的说法。而科学之不断进展，也正在以新的“可信”方式帮助人们寻求更“可爱”之境。

如何让可爱者可信，或如何让可信者

可爱，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是，无解有时候是任意解的代名词，人文世界的魅力就在于不确定性，这才能打开思想和艺术萌芽、开花空间。被此类看似无解的问题所困扰的灵魂，则是无比高贵的。那些庸庸碌碌、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之人，眼里看的，心里想的，无非真金白银这样的“可信”之事，稍远一点的地方，就懒得去费神、去张望，至于梦想什么的，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些虚无边际的异想天开、迂阔迂腐的空头讲章，更是不屑一顾的了。

王国维的身边并不乏这两类人。而他的自沉，正是对他身边这两类人最后的鄙视。1927年6月2日的早上，王国维从家中走出，来到他供职的国学研究院，写好遗嘱，收入衣袋。向事务员借了五块钱。步行到校门外。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购票入园。来到排云殿西侧的鱼藻轩，跳入水中。一切是那么从容平静、不慌不忙，似乎只是去赴一个早就订好的约会。他的死以及赴死的平静，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道难题，诱导人们在猜解中证悟世间的真谛。